

萧乾文集

1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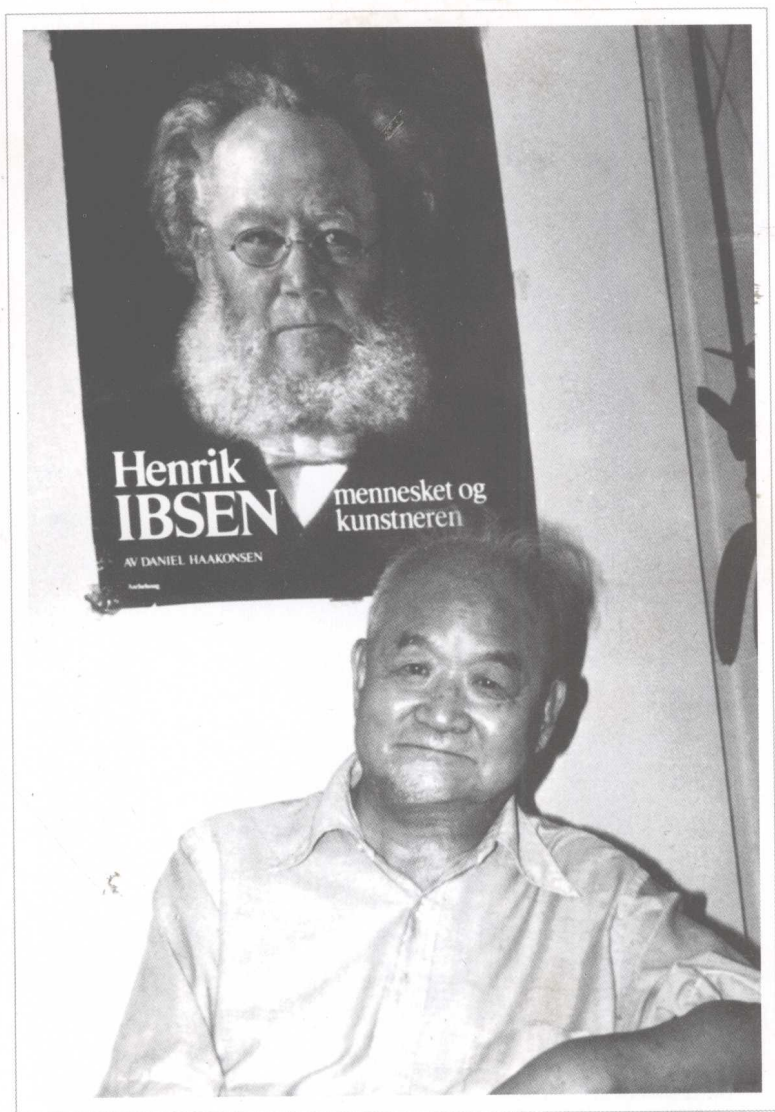
萧乾文集

小说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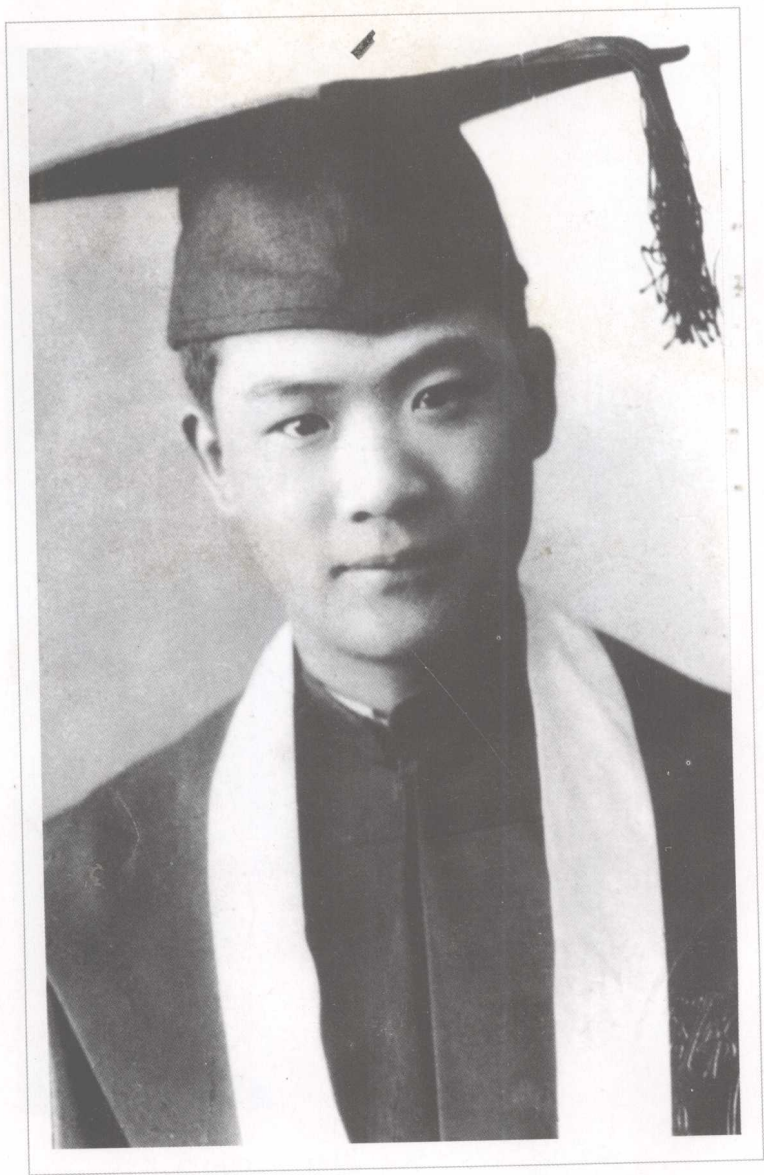
傅光明 编

1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在挪威作家易卜生像前（1990年）



燕京大学毕业照（1935 年）

出版说明

萧乾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、记者、翻译家、编辑家。蒙古族。1910年1月生于北京。三十年代初就发表小说，成为京派后起的作家。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后，在天津、重庆、香港主编《大公报》的文艺副刊。1939年到英国，先后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、剑桥大学英文系研究生。1944年后，以《大公报》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身份，亲临二次大战欧洲战场，撰写了大量通讯特写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英文版《人民中国》副主编、《译文》编辑部副主任和《文艺报》副主编。1961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。现为中央文史馆馆长。创作有小说、散文、特写、通讯报道、书评和文论，并翻译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，已出版著译四十部。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和阅读、研究萧乾的作品，并为研究我国现当代文学提供资料，特编辑出版《萧乾文集》。

这部文集收编萧乾在各个历史时期创作的绝大部分文学作品，共三百二十余万字，分为十卷：第一卷小说，第二、三卷特写和杂文，第四、五卷散文，第六卷生活回忆录，第七卷文学回忆录，第八、九卷文论，第十卷书信。

为使文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所选作品除对误植漏排和明显的文字差错进行必要的校正外，一般均按最初发表时的原文排印，以保存作品的历史面貌（包括当时的译名、词汇、方言、习惯用语和标点符号等）。入选作品均按发表年月排序，并注明

出处。为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写作背景，个别作品的篇末还附有萧老近年新写的“余墨”。

在文集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了萧乾及其家属的大力支持，萧乾并为文集作序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担负了具体的编选工作。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1998年10月

本 卷 说 明

本卷为小说卷，收录作者自1929年11月至1947年11月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二十六篇。其中《梨皮》、《人散后》从未收入集子。短篇小说分别选自《篱下集》、《栗子》、《落日》、《灰烬》和《珍珠米》等集子。其中《梦之谷》按1938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收入。

自序

编文集难免会暴露作者的心态。八十年代初当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出我的选集时，我对把旧作聚拢一下当然十分欣喜，然而那时我刚从五十年代的紧箍咒和后来杀气腾腾的“文革”那阴霾日子中走过来，心中还颇有余悸。所以交稿就参照五十年代的教条及六七十年代动不动就“批倒批臭”的那些棍棒在心里所形成的枷锁，对三十年代以来的旧作大砍大伐，以至海外朋友如香港大学的赵令扬及黎活仁两位教授都深感震惊。这回，我决定所有1949年前的旧作，一律都用老版本来排版，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。

自从1979年这枝笔又回到我手中以来，我可一刻也没让它闲着。这辈子足足丢了二十二年。我一直在努力把丢失的岁月捡回来，能捡多少就捡多少。

我是在二十世纪第十个年头出生的。如今，再过一个来年头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了。我即便能同那个世纪照个面，估计那时候，我也会老得拿不动笔了。从开始写作，我就总喜欢同读者谈心，这回，我当然更不会放弃这机会，用意不外乎为了缩短我同读者之间的距离。

不少朋友自幼都打下古典文学的底子，我则出生在一个穷蒙古人的家中，我老爸竟没等我出生就走人了。活着的时候，他的营生是管开关东直门的城门。寡母是文盲。早年家里除了一位喜拉胡琴哼几声二黄的堂兄，就是识几个大字的堂姐。她个子矮，相貌平

庸(所以一生未嫁),但她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和一肚子的传奇演义。她时而为我说《三侠五义》,时而又哼几句《三娘教子》,她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。她背得最熟的是一本《名贤集》,其中,她反复教我的,是“既在矮檐下,怎敢不低头”。小时候,苦命的妈妈在外佣工,把我寄养在婶婶家里,过的正是寄人篱下的日子。那段畸形的生活曾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健康的烙印。1957年后的那些年,我好像又回到动辄得咎的童年。

所以每当人们问起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最喜爱什么的时候,我总毫不怀疑地回答说,是小说;而小说中,我最心爱的又是《篱下》和《矮檐》。我并不是在品评它们在艺术上的优劣——那属于批评家的神圣领域,原作者不应说三道四。我喜欢的不是它们写得如何,尽管其中情节大都是虚构的,但它们是抚摩着自己心灵中的伤痕写成的。

说起小说,我一直把《蚕》当作我的处女作。而这次,编者傅光明同志把我1929年在《燕大月刊》上发的小说《梨皮》翻了出来,如果把它算作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,那我的写作也有七十个年头了。一晃我也成了九十岁的老人。1932至1933年,我在福州教过一年书。《蚕》的背景是福州的仓前山和大桥头。小说中的“梅”是我当时的女友:已故的高君纯女士。她虽是闽侯人,但并没到过福州。是我硬把她“搬”到那里,陪我发挥了一通很不高明的“宇宙观”。那时我认为人不是自己的主宰,冥冥中有一只大手在摆布着一切,而那只大手也不是万能的。其实,我脑子里闹腾的不过是一场宇宙不可知论。

当我更成熟了一些时,我这种不可知论就为“事在人为,人定胜天”的观点所代替了。我不再琢磨谁在主宰着宇宙这个玄而又玄的问题了。说是实用也好,反正更脚踏实地了。我已排除了命运的想法,回到了种瓜得瓜的现实主义观点。一个人的前途如何?国家

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如何?这些统统不可能有预先的答案。答案就在我们每迈出的一步。我认为生活是同宇宙的一场对垒,如棋局,输赢全在每一步,背后是良知和机智。个人如此,整个民族也如此。其中,关键在于能不能和肯不肯汲取前车之鉴,善不善于倾听时代的声音。“四人帮”之一意孤行,倒行逆施,就是由于他们忘记了希特勒的下场。

虽说是个未带地图的旅人,但我一直在寻找并辨识人生的方向。早在1934年我就在《我与文学》一文中,说出了我的志向,我为自己规划的航向是:通过新闻工作以达到文艺创作的目的。我是想先写通讯报道,最终想写的是小说。然而世事不可能尽如人意。现在回顾起来,记者我倒是在国内外当了十几年,然而1949年正当我结束记者生涯,想动手创作时,我变成一个只能服从分配的螺丝钉了。那时,除非来自老区或少数党外重点统战对象,要想专门从事创作已不现实。而到了六十年代,再回首人民共和国最初那十几年,没能从事创作却是我莫大的幸运,不然岂能逃过“梁效”先生的刀斧。连这样,1957年还大翻老账,甚至明明针对国民党的塔塔木林也算作反党罪行哩。

所以当想起“三家村”诸公以及六十年代红色风暴中的受害者,我就感激1957年的反右运动,因为它老早就夺去了我手中的笔,封上我那多事的嘴。然而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像遇罗克和张志新那样真正的英雄。我这个在矮檐下长大的人自知在逆境中没有他们那份能力,然而我又不甘随波逐流。所以面对巴金“说真话”的号召,我只敢答以:尽量说真话,坚决不说假话。连这一点,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真正做到。

1979年以后,当那枝秃笔又回到我手中时,我可没让它闲过。1957年我曾发誓今生再不舞文弄墨。其实,那完全是出自阿Q心理,当时想弄也不让弄了。

1979年后,首先海内外的报刊编者们就不让我闲下来,四面八方都来索稿。我本就手痒了足足二十几年,同时,又受到新时期新事物的感召,就又写起来了,而且劲头还很足。这里十卷文字中,有一半都是这近十几年写的。这段时间里,我总觉得受到两方面的鞭策。一方面是死亡;我自知离八宝山不太远了,因而懂得了抓紧时间;另一方面每逢想到多少好人能人都死了,自己却活了下来,就觉得只有加倍努力,才对得起自己的这份幸运。

我决心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。

如果要我界定一下以前的和近时所写的,我想从前我曾经努力的是描绘人生,近年来则是在咀嚼人生了。尤其我最近为早年作品所写的“余墨”,有的回忆当年写作的动机及背景,也有的属于借题发挥。我希望它们不至于搅扰阅读。倘若有时还能增加点透明度,那就更好了。我本想再多写一些,可写着写着笔就涩了,我也不想勉强自己。这里有些文章,如《拟J. 玛萨里克遗书》,由于事过境迁,读来可能莫知所云。“余墨”对读者可能有些佐助。这也是我最初想起写“余墨”的动因。

我是个喜欢追忆过去的人。《未带地图的旅人》之前,我就曾写了不少回忆性质的文章。有些朋友抱怨我在书中淡化了自己曾折腾了一辈子的感情生活,四次结婚竟然一笔带过。他们读了不过瘾。这一点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。同“小树叶”分手,责任应全部在我,她是无辜的。至于另外两次婚姻的破裂,则双方都有责任。现在去揭那伤疤,不但徒寻苦恼,说不定还会打官司。反正1954年与洁若结缡至今,我们恩爱如初。西谚说,人生始自四十。我在四十岁上,魂儿才真正安顿下来,再也不愿折腾了。也只是这样,才能出点活儿。

总之,命运对我不薄。1935年毕业半个月后,我就去天津《大公报》上了班。我先后编了六七年副刊,一边还写着通讯。我跑过鲁

西水灾,岭东潮汕,滇缅公路,最后还赶上了六年欧战。1946年回国不久,就去了海南和台湾。1950年我又被派去参加土改。我曾报道了五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。

改造了七八年,到1957年一临考试,仍没能及格。那以后三年多,我成为一名单纯的体力劳动者,而且是惩罚性的。劳动,我不怕,可那时被降为次等公民,滋味终身难忘。

然而祸福是难从表面上分辨的。那枝笔从我手中被夺走后,忽然松动了几年。于是,言论界又活跃起来了。没几年三家村诸公就又大遭其殃。

1979年气候由阴霾又变为晴朗。头上的那顶帽子蓦地不翼而飞了。不但个人复生,国家的四肢也由僵直而灵活起来。我真诚希望我们的路线越走越宽,新一代的才智能毫无忌憚地发挥出来。

即将迎来二十一世纪。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。我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往昔的教训。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,而且也是一个自由、文明、合理、公正,一个畅所欲言、各尽所能的国家。

最后,我要特别感谢傅光明同志,这位我在八十年代末结识的诚笃、踏实、勤奋、刻苦的好青年。我是眼见他在写作和文学研究的路上成长起来的。他是个多面手,能写、能译,编书更是行家。他这次为编我文集,泡在图书馆里查阅旧报刊,翻出来许多我都记不得的旧作,尤其是特写。没想到年轻时爱玩儿偷懒的我,还真写了不少。光明还把我在英时的两本英文讲演录译成了中文,这可是它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同国内读者见面。能结交这样一位青年朋友,是我晚年一大幸事。我已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,快与外界隔绝了。我盼着每个礼拜——他来看我。他能给我带来外面的消息和发生的新鲜事。重要的是,他的朝气能减缓我的衰老。

萧乾

1998年6月16日于北京医院

目 录

自 序	萧 乾
梨 皮	1
人散后	6
蚕	11
小 蒋	21
邮 票	29
花子与老黄	40
邓山东	52
丑 事	62
印子车的命运	73
俘 虏	82
篱 下	92
放 逐	102
雨 夕	110
皈依	116
县	132
道 旁	146
参 商	161
栗 子	176

矮檐	187
吉期	202
鹏程	208
黑与白	222
落日	235
梦之谷	244
一只受了伤的猎犬	403
珍珠米	410

梨 皮

“狗儿……，家来罢！”

朱二奶奶抱着五岁上秃子，迎着风，冒着寒，立在破门槛上喊。

往常，这时分狗儿早回来了；怪，今天还不见他瘦小的影儿。她明知道孩子身上穿得单薄，天气又恁般地冷；就是穷，妈妈也总是疼儿子的。

这时，大学的先生们全用膳去了！方才热热闹闹的操场上，现在却塞满了冰冷的黑暗。

襁褓中的秃子，抱在二奶奶底怀里，随着他妈东瞩西望地摆动，在暮色苍茫里，看见了大学图书馆里的电灯，玻璃宫般地闪烁着；大学壮丽的楼房，齐整地排列着。腊月的天气，在北国里，算是冷到头儿了，由那削脸的北风里，刮来宿舍里先生们底胡琴和二簧的袅袅余音。在那声音里，寻不到一点人间辛味，只有满足的愉快，享乐的高歌。

这些影像，在熟惯了的二奶奶眼中，除了“望尘莫及”以外，早已变成平平常常的事了！只有在这才来到人间短短的五年，洁白的心田，不曾如一般人们之“人间化”的秃子却勾起不少异感来。

“妈！”小手儿由滚热的母怀里伸出，指画着说。

“他们真好！”难为他从狭小的 Vocabulary 中，凑出这么几个字，来表示他底景慕。

“都是洋人盖的！……狗儿！……”

她又挑高了嗓音，喊起来。

这塞北的寒风，带来的，除了凛冽的冰冷外，还夹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，鬼号般的哨呼，直好像这些都在锻炼一颗慈母底心。

“妈，窝窝头该揭屉了！”

大姐——她底女儿——跑出来，扯着他妈底衣襟，叫着。

“你爸爸也还不来！”她望着那一片黑魑魑里的卤影，吐了一口气。真的，朱二今天回来得也不算早了！说来也是天作之福：他们一家老小底饭，都是仰赖着大学。朱二是给工程处雇去了。二奶奶就替木匠瓦工们缝缝补补。可是一家子里能抓钱的，还莫十五岁的狗儿。

谁都说狗儿有点儿鬼机灵。是的，他自幼嘴儿就甜，会哄人笑。他姥姥说：

“穷人能生张‘贫嘴’，再有点听话的奴性儿，便是造化，便不愁饿死了！”

这话既出自老人，总不会错。狗儿底‘抓钱之道’是天天在网球场上给先生们拾球儿。先生们又多是慷慨豪爽的，不像工头儿对他爸爸那般苛，所以一天总挣个三四毛钱。孩子又护家，不爱贪零嘴，所以叫朱二夫妇更疼爱他。

二奶奶走进屋来，看见大姐把小饭桌已经放在小炕上了。

一盏破油灯，是摆在小桌儿的北边儿，把一家大小底人影儿，全模糊地映在贴了不少旧的大学毕业典礼秩序单的黄墙上。炉上的笼屉，冒着热腾的蒸气，弄得小屋儿好像下起雾来。

二奶奶把秃子放在炕犄角，挽挽袖头儿，揭锅去了。

“妈，黄先生叫我上他屋子去了！还赏我梨吃呢！”

狗儿不等门拉开，嚷着就进来了。那梨的滋味，可由那浮现在他面上的微笑体会出。他手里还捧着一把梨皮，杂着寒噤，告诉他

妈说：因为梁先生进城去了，黄先生也许有点寂寞，横竖是一时高兴，居然把他拉进大楼里坐了一会，又把吃剩下的三个鸭梨给他吃。又说怎么一定要他削梨皮，他怎么可惜；临走，又怎样假意说把他们抛去，而偷偷地，一溜溜带了回来。

“给我一片，一片厚的！”秃子耐不住了。

“你也不瞧瞧你什么脑袋！一脸野气，一身虱子，也配进先生底大楼！”二奶奶其实是骄矜起来，证据就是他欣笑着说。

她把梨皮分成几份：给朱二留一份，孩子们各一份，自己也占一点光。

“喝，那房子真暖！”狗儿搓着手，哈着气，吹起法螺来。他告诉他们现在连牙粉全不时髦了，先生们用得全是牙膏。为着“牙膏”，还费了一番解释；然后才继续讲汽管的神妙，电灯的便当……

“人家拉屎的地方，全比……全比咱们炕上，锅里，碗里都还干净多了！”狗儿满屋里找，也找不出可比拟的，形容的对象来。他所例举的，虽已令炕上的秃子，炉旁的妞子，伫立的二奶奶全惊愕起来，而在他却还感到太不惬意，——离实际还远远呢！

他又说黄先生怎么把他底情人的像片，供在书桌上。“神仙似地”是他对于容貌与一切的形容——最高的而比较满意的形容。

又说李先生怎么自拉（胡琴）自唱；梁先生怎么同蒋先生逛去……甚至于吴先生今天晚饭一生气，把一桌连盘带碗全给砸碎了，闻全尽力说了。虽然其中，不免因狗儿“井中蛙”之见，而述说过分，但炕上的秃子却都呆呆地老实了。

由于夸耀黄先生会写英国字，还有一堆堆地洋文书，他忽然问他妈：

“为什么我不能念书？”

这可真给他妈难着了！因为二奶奶虽是识的人，可是总会晓得